



# “一带一路”上结出更多科技果实

■ 张景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打造全球化新平台,推动“一带一路”相关地区和国家开展国际科技创新与合作,为共同创新增添发展新动力,是国际科技界共同的愿望。

## 苹果进化之谜

2017年8月中旬,有报道称,美国博伊斯塔姆森植物研究所、美国康奈尔大学和中国山东农业大学经过基因测序对比,破解了苹果进化之谜,并向世界宣布:苹果是当年丝绸之路传播进化而来的。

2000年前的丝绸之路推动东西方文明交流合作,并留下里程碑式的足迹。今天,源远流长的丝路文化也在助力科技丝路开辟

新时代,新纪元。

今天,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是继续坚持经济全球化、坚持发展创新高科技,还是奉行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是当全球化的积极力量,还是消极力量?这些将决定世界向何处去。

从国际情况来看,国际贸易额下降和贫富差距扩大迹象令人担忧。“一带一路”倡议可谓应运而生,是推动国际社会走出困境、走向繁荣的发展之路、光明之路、文明之路。

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是开展互利合作的抓手。“一带一路”上的不少国家基础设施较弱,即便发达国家也有改进的空间。中国在钢铁、水泥等多个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在基础设施方面具有较强的设计、建设能力。在此背景下,发挥国民储蓄和外汇储备优势,调整金融结构和投资方向,帮助“一带一路”上有需要的国家建设

基础设施,推动路通财通、实现双赢,将成为全球经济再次腾飞的发动机。

## 建设创新网络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深刻改变人类社会,新经济、新业态、新动能发展强劲,新兴经济体迅速成长。当今世界,创新已成为重塑经济结构和经济格局的关键。

近年来,中国科技事业稳步发展,2018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超过全球总量的20%;科技工作者有8100万人,年毕业大学生700多万人;专利申请与授权量连续几年位居世界第一。同时,建设了一批先进的大科学装置,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如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嫦娥四号、载人航天、卫星导航、超级计算、量子通信、深海探测、5G、高铁、半导体照明、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中国有实力也有意愿与国际科技界进

行深度交流与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搭建了有益的平台,可以广泛联系和凝聚相关国家的科学家,深入开展科技交流与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创新网络建设。通过构建战略咨询库,成为高端科技创新中心,共同勾画“一带一路”科技发展愿景;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推动创新,促进“一带一路”科技的互联互通与互利共赢;深入讨论共同关心的科技问题,以高质量的研究抢占国际科技制高点,谱写科技创新、互利共赢的凯歌。

总之,开放的系统充满活力,封闭则会面临淘汰。从狭隘到广泛、从局部到全球,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发展趋势。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征程中,依靠科技合作与创新,完全可以结出更多的“苹果”,引领世界走向精彩未来。(作者为科技部原党组成员、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常务副主席,本文为作者在复旦大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国际论坛上的发言,见报时有删节)

# 打好长三角信用一体化“地基”

■ 李杰群 宋晓东

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信用信息是信用体系的“地基”,信用信息整合是长三角信用体系一体化建设的关键步骤,对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优化营商环境、提高社会治理水平都会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 公共信用信息“各自为政”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信用信息是信用评价的基础条件,信用监管的判断依据、信用惩戒的数据支撑。信用信息的完整程度、规范程度和标准化程度,关乎信用评价的准确性、信用监管的恰当性、信用惩戒的公平性以及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

信用信息是多维度的,对每个信用主体而言,其信用状况体现在经济活动、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例如,在借贷中是否守信,在交易中是否守信,在社会生活中是否守信,等等。如果仅用单一或部分维度的信用信息来刻画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无异于以偏概全甚至“盲人摸象”。因此,有必要进行信用信息整合。

信用信息整合是长三角信用体系一体化建设的必然要求。目前,长三角三省一市分别出台了地方条例或规章,对公共信用信息进行规范和管理,如《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江苏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试行)》《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安徽省公共信用信息征集共享使用暂行办法》等。

但从具体内容来看,各地公共信用信息归集有不同的范围和标准,行政区划和执行依据的差别,客观上造成了长三角公共信用信息的“各自为政”。

信用信息整合是丰富信息维度的重要方式,是完整描述主体信用状况的重要手段。目前,金融信用信息以央行为主进行归集,市场信用信息则还没有主体进行统一归集。各个维度的信用信息是分散的,难以发挥更大作用。

长三角地区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引领示范区,应当打破藩篱,在信用信息整合方面大胆尝试,为信用评价、信用监管、信用惩戒等信用活动提供更多维度信用信息,为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转变政府职能、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探索经验。

## 跨区域、跨领域共享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推动长三角信用体系一体化建设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有突破信息分散的壁垒,统一信用信息归集标准,通过信用信息共享,做到跨省市联合惩戒,加速区域信用体系一体化的发展,才能推动长三角区域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资源更加高效、合理的流动,降低资源流动成本和损耗,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提升长三角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水平。

首先,信用信息整合要有统一的法律依据。法律及相关制度等“硬约束”,是信用信息整合规范化的必要条件,也是起点和指引。信用信息整合既要全面,又要对信息主体的商业秘密或隐私进行保护,二者需要兼顾和平衡。建议考虑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先试,厘清信用信息归集范围、优化归集程序,统一归集标准,为长三角区域内统一信用信息整合提供实践依据和经验,也为进一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实际探索。

其次,信用信息整合就是实现完整性,即在法律约束范围内,在对长三角区域公共信用信息整合的基础上,整合金融信用信息和市场信息,从而实现信用信息的完整性。

要推动信用信息跨区域整合。由于长三角区域各自特点和现实情况不同,三省一市各自

制定了公共信用信息归集法律法规,使归集标准和范围有所差异。对公共信用信息进行跨区域整合,就是要对长三角三省一市的信用信息归集标准和范围进行统一。这既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决定的,也是长三角信用信息整合的基础性、关键性步骤。公共信用信息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设施之一。通过公共信用信息的整合,形成统一的公共信用信息标准和范围,是长三角区域包括信用评价、信用监管、信用惩戒在内的信用活动形成统一步调的基本保障。

要推动信用信息跨领域整合。信用信息不仅包括公共信用信息,还包括金融信用信息和市场信用信息。公共信用信息主要用以记录信用主体在社会活动中的信用状况,金融信用信息和市场信用信息用以记录信用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信用状况。这些信用信息覆盖了信用主体在经济社会领域的主要活动。下一步,有必要将这几类信用信息跨领域整合,并对范围和标准进行统一。

再次,信用信息整合应该有利于共享。公共信用信息、金融信用信息和市场信用信息的整合,除在范围和标准上统一外,还应有统一的技术要求。现实生活中,各类信用信息归集主体都按照相应技术要求搭建信用信息数据库,这使得数据征集范围、数据结构、实施技术等各不相同。因此,必须统一技术要求以利于共享。这不仅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现实需要,也为进一步实现全国信用信息的整合提供坚实基础。

总之,长三角跨区域信用信息的全面整合势在必行。长三角区域信用信息在范围、标准和技术要求方面进行整合,是长三角信用体系一体化建设重要的基础工程、关键步骤,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会产生持续的、积极的影响。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对信用信息整合进行先行先试,是一个重要的实践探索和检验,将为整个长三角信用体系一体化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

(作者分别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副教授、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经济师)

# 发展“数字货币” 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 吴培新 李湛

研究显示,在区块链技术支持下的“数字货币”,有望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突破“金融围堵”中起到重要作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货币的电子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借记卡、信用卡、电子钱包、手机支付迅猛发展。近年来,随着手机的广泛使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支付越来越“无现金化”。在中国,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创建了一个集消费借贷、支付为一体的新业态,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

然而,这种移动支付依然是基于银行账户的传统支付方式延伸,尚未真正满足数字金融时代的变革要求。于是,“数字货币”概念应运而生。自2009年创建比特币以来,全球涌现了多种“数字货币”,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缺陷。特别是,比特币由于投机性及技术问题,价格容易大起大落,与币值稳定这一货币基本属性背道而驰,不同程度地干扰了货币金融体系的正常秩序。

当然,也有一些币值相对稳定的“数字货币”。但它们主要由私人公司发行,没有国家信用支撑,一般只能用于主权货币非核心功能的商业领域。

由一国央行发行和维护的主权“数字货币”,是基于国家信用的法定“数字货币”,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与纸币有同等价值和使用效力。这与私人公司发行的“数字货币”有本质区别。

在“数字货币”领域,中国走在全球科技金融的前沿。中国人民银行即将发行的“数字货币电子支付”(DCEP),就是基于区块链技术推出的全新加密电子货币,可以助推人民币的国际化。

新形势下,建议加大政府及社会各方面的投入,进一步占据主权“数字货币”技术的全球制高点。例如,建立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商业银行和互联网企业参与的DCEP研发小组或实体组织,既发挥政府的引领、协调职能,也充分发挥商业机构的利益驱动功能,增强研究力量,开放研究资源,实现研究成果共享。

同时,可充分利用移动支付的成熟经验,依托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渠道,先在国内进行小范围试点,提高技术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稳定性。在技术成熟的基础上,以现有的人民币支付清算网络和渠道为依托,开展DCEP的国际支付清算。现有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体系以及商业银行、支付宝、微信等机构的海外运营网络、渠道应当为DCEP走向海外提供支撑。

此外,还有必要加强与各国央行、国际组织的沟通、协作。一是在各国主权“数字货币”国际化方面实现互惠互利、双向开放,扩大DCEP走出去的渠道;二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组织在兼容人民币主权“数字货币”的基础上联合开发新产品,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向全球法定“数字货币”转型提供中国方案。

应当看到,DCEP的国际化是国内货币制度向国外的延伸,国内货币制度的完善是人民币和DCEP国际化的基础和保障。要继续推进国内金融改革,加快利率、汇率改革,完善基于市场的利率浮动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探索放开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不断提升中国法定货币的国际投资交易职能。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

# 推动区块链应用 加强个体隐私保护

■ 徐学通 吕俊廷

大数据时代,处处留痕可寻,事事有迹可查。人们对自身隐私遭受侵犯的“嗅觉”正在失灵,“我的数据,我却做不了主”的情况日益蔓延。

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既能将分散的数据有机联合,又能通过加密算法保护参与各方的隐私,有望成为加强个体隐私保护、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工具。

第一,区块链能够增强个体对自身隐私的控制。依据“谁控制,谁使用,最大价值就属于谁”的原则,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收集、挖掘、利用被牢牢地掌控在网络服务提供者手中。区块链则可以让用户保留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权;首先,公民可以在区块链上创建一套独立的身份,控制了这个身份就能有效保护好自身的隐私;其次,区块链分布式存储的方式,能够有效抵御外部的攻击;最后,区块链上的交易数据对所有用户都是开放和透明的,便于个人紧密追踪自身数据的使用情况,从而加强对个人信息的监控。

第二,区块链可以防止第三方对个人隐私的窃取。区块链通过控制第三方对个人身份的侵入,保障公民的隐私无法被其他用户窃取。这是因为区块链可以创建一个数据网络交易,非交易者不能通过其他途径对用户的数据进行访问。

此外,区块链的非对称加密技术,为使用者分别配备用于公开接受信息的公钥和用于解密私密消息的私钥,私钥采用高级加密的策略,可以有效限制他人的访问。同时,私钥只能单项加密而不能反向解密,进而起到防止个人隐私遭到第三方窃取的作用。

第三,区块链凭借多中心的架构降低用户隐私泄露的风险。目前的服务器架构,大体都经由一个中心化的根服务器来传输数据与指令。区块链将重塑互联网数据的传输方式;首先,区块链采用分布式的网络结构,使得设备之间能够保持共识,而无须与中心服务器和数据库进行验证;其次,这种架构没有中心数据服务商,也就不存在批量用户信息泄露的问题;最后,区块链中各个节点之间地位平等,通过中继转发的方式彼此联系。

从根本上来说,解决隐私权泄露的问题,就是要让个体真正掌握处理隐私数据的权利。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非对称加密等特性,为这一赋权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和实现路径。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华东政法大学)

# 筑牢全面小康的“生命健康网”

■ 潘鸿雁

国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国家富强的标志。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既折射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也彰显了大国情怀、人民情怀及责任担当。新时代,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抓紧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坚持问题导向,抓紧补齐短板,积极完成健康中国战略任务。

## 从战略到行动 健康中国的实施路径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我们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2019年,国家层面成立了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制定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聚焦开展15个重大专项行动,努力使群众不生病、少生病。具体来看,健康中国行动路径沿着三个层面持续推进:

个人层面——随着疾病谱的不断变化,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国民健康的重要挑战。慢性病主要是由饮食结构不合理、不运动或缺乏运动等造成的。因此,必须从改变个人的生活方式入手。要明确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管住嘴,迈开腿”,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真正做到自我健康管理。

政府层面——生活方式既是个人的选择,也与个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有关。因此,健康管理不仅是个人的责任,也是政府的责任。政府有义务设计制定和实施促进健康的公共政策,将“健康融入万策”。

例如,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城市新型公共卫生服务需求不断增长。传统的应对方法是增加医疗公共卫生投

入,是“治已病”,但成本较高且供不应求。海内外的实践证明,更为有效的方法是以人口为基础预防。这就需要与健康状态、健康生活方式相关的部门协同合作,提早进行健康干预,包括注重发展老年教育、加强健康食品供应、增加城市绿化带、改善空气质量等。

社会层面——健康是一个大概念,既包括健康实施主体多元化,也指健康客体多元化,涉及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环境、健康保障、健康产业等。因此,应当形成多方共治的格局。比如,健康宣传对于普及健康生活方式非常重要,但营造健康的生活氛围、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同样不可或缺。“医教结合”“体医结合”“体教结合”以及“健康食堂”“营养支持型社区”等,有助于打破原有的藩篱,改变卫生健康部门“单打独斗”的局面。

## 从行动到能级提升 健康上海的实践特色

上海在全国省级层面率先制定《健康上海行动(2019—2030年)》,推出健康上海建设的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并将18项重大专项行动分解细化为100条举措。下一步,对标国际一流水平,上海应当抓住“三个突出”,走出一条体现符合超大城市特色的健康发展新路。

突出健康智能化。在对照国家行动任务的基础上,上海增加了长三角健康一体化、健康信息化、健康国际化等内容。其中,健康信息化是健康智能化的重要体现,是智慧城市建设和健康领域的延伸,包括智慧医疗、医学人工智能等。

例如,作为上海“互联网+医疗健康”公共服务的统一入口,“健康云”已经能够向市民提供26类58项健康服务。接下来,上海将加速推广“健康云”,进一步为市民提供一站式、精准化的健康教育、管理和服务,为市民筑牢“生命健康网”。

# 始于中国城市 用于中国城市

■ 刘士林

回顾历史,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体走过了两个阶段:一个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以政治理念为中心,服从服务于国家发展和政治需要;另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型城市化成为主导。

这两种模式各有各的历史合理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前者的问题在于“政治”压抑了“经济”,导致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窘迫;后者的“失”主要表现在环境资源领域和社会人文领域,一个威胁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条件”,一个威胁到城市健康发展的“主体条件”。相关问题和矛盾缠绕在一起,是造成“城市病”的深层次原因,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

为了解决“城市病”的挑战,党中央和国务院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从内容上看,有的是全局性的,如《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有的是重点战略,如“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也有一些是专项工作,如全面二孩政策、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流转、特色小镇建设等。从性质上看,有的属于转型升级,有的属于补短板,有的属于创新实践。从实施效果上看,有的立竿见影,有些属于“小火温补”。这些“始于中国城市,用于中国城市”的新理念、新政策、新实践,深刻地影响中国城市的形态、功能和性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影响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寻求破解“城市病”的根本之策。

一是以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为核心。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推进城镇化要注意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并确立了“既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原则。

二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抓手。《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绿色化”概念,并将其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并列。特别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城市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健康发展提供了战略思路和科学评价标准。

三是以完善政绩考核标准为引领。一段时间里,“以GDP论英雄”成为考察干部工作政绩及评价城市竞争力的主要标准。与之相伴,出现了城市化速度和质量不对等、规模和内涵不协调、“面子”和“里子”不匹配等问题。由此,建立科学的、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政绩考核体系,以此来引领城市管理者改变传统思维方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

2013年底,中组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规定各类考核考察不能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在解除“GDP紧箍咒”的同时,还把对政绩考核与绿色发展等紧密结合起来,明确要求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等指标的权重。

习近平同志在为《福州古厝》作序时指出: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首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首要责任,二者同等重要。可见,把政绩考核从单一的GDP指标拓展到环境、民生、文化等方面,对于纠正“唯GDP化”“房地产化”和“政绩工程化”为代表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本专栏文章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提供)